

天命：当中国成为世界领袖

The Mandate of Heaven: When China Leads the World

一、文明的原点：两座山峰，两种逻辑

在人类文明的源头，矗立着两座隐喻性的山峰，它们分别定义了西方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生存逻辑与治理基因。

一座是西奈山。先知摩西在雷电中独自登山，面对神意。他带下山的不是面包，不是工具，而是两块刻着十诫的石板。面对旷野中混乱的以色列各支派，摩西确立秩序的方式是“立约”（Covenant）——确立人与神的契约，并由此衍生人与人的契约。这一刻，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底色：相信规则的神圣性，相信秩序源于习惯权利。这是“规则导向”治理的终极源头，在现代西方演化为对“程序正义”的极致追求。

另一座是涂山。大禹在此会盟诸侯，但他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泥泞中跋涉了十三年。面对滔天的洪水，大禹没有逃去旷野等待天上掉下来的“manna”（吗哪）和鹤鹑，而是拿起了耒耜。他确立秩序的方式是“工程”（Engineering）——疏通河道，削平山川，将肆虐的洪水纳入江河，从而划定九州。这一刻，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底色：相信实干的力量，相信秩序源于对物理世界的改造。这是“结果导向”治理的终极源头，在当代中国体现为“工程师治国”的实干传统。

这两座传说中的山峰就象征了数千年来人类治理的两种原型：一种关注权利的界定，预设了神恩眷顾的温室花园，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辩论和立法来切分蛋糕；一种关注问题的解决，预设了洪水肆虐的荒野世界，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改造自然、重塑山河来做大蛋糕。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西方的“规则的逻辑”——制度决定论——主导了全世界的观念；而今天，中国的崛起正在向世界展示“工程的逻辑”——建设优先论——的力量。

二、美国神学的傲慢：拿“运气”当“能力”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叙事，长期由一种源于自由主义右翼的话语体系所主导，我们不妨称之为美国神学。

它将英美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所带来的先发优势，误认为是其制度文化的内生优越性。它将西方的制度模式奉为圭臬，认为只要照搬英美的“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繁荣就会自

动降临。它把基于特定“好运”形成的西方发展模式普世化，本质上是一种拿运气当能力的廉价成功学。

美国神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它忽略了西方（以英美为代表）的兴起，根本而言是“天选之子”的幸运，而不是可普遍复制的经验。

傲慢之罪使它敢于宣称真理在握，敢于用单一的价值尺度——即西方的制度模式——来衡量复杂的历史进程。在美国神学笼罩下的中国现代化叙事中，数千年中国历史被简化为“专制、停滞”的黑暗历程，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文明的辉煌，人民从未创造过值得骄傲的成就。更为吊诡的是，这种叙事愿意为中国历史开出了一扇狭窄的天窗，选择性地肯定后四十年，将其描绘为向西方制度靠拢的必然结果。却不愿意，也不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中国故事。

这不仅贬低了中国人民在恶劣环境下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误导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唯有超越这种神学，看清“温室”与“荒野”的区别，我们才能彰显“中国道路”的伟大——这是一个依靠人的力量逆天改命的故事，也是每一个没有“天降好运”的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的故事。

三、 历史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博弈

让我们回到最底层的视角。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类战胜自然、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故事。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塑造了不同民族的生存策略和文明形态。这不是文化优劣的问题，而是环境适应的结果。

中国文明，是一个以大禹治水为源头和象征的伟大叙事。在世界文明史上，很少有哪个文明像中国这样，将人与自然的斗争提升到如此核心的位置。黄河、淮河的治理，都江堰、郑国渠的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这些工程奇迹背后，是一个民族与水旱灾害进行的持续搏斗，是农业文明在东亚大陆上的适应历程。

中国文明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世界前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手工业技术、城市化水平、生活水准都居于世界前列。问题不在于这个文明本身有什么根本性的缺陷，而在于它面临的环境挑战，最终挡住了它自发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四、 工业化的前提：有效市场及其物质基础

工业化不会凭空发生，它需要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除了英美等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条件并非天然具备。其中最关键的，是“有效市场”的形成。而“有效市场”的前提，是稳定而充足的粮食和能源供应。

其中的逻辑链条既简单又明白：只有当粮食生产足够稳定，人们不必为基本生存而忧虑，劳动力才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只有当能源供应足够充裕，机器才能持续运转，工厂才能大规模生产。没有这两个基础，所谓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脆弱的，无法支撑起现代工业体系。

经济学家常常抽象地谈论“市场风险”，但很少追问：风险从何而来？答案在于：**粮食和能源**。作为位于经济链条最上游的生产生活资料，它们的价格波动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稳定性。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具体度量的：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决定了不同国家的粮食能源供应状况，进而决定了它们的市场风险水平。

乾隆大皇帝有句话说得透彻：

> 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莫不准此递加。

当粮食能源剧烈波动时，整个价格体系就会震荡。今年粮食丰收，价格暴跌，农民收入减少；明年可能歉收，价格暴涨，城市居民购买力下降。这种波动不仅影响粮食市场本身，更会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企业无法预期稳定的需求——消费者收入不确定，购买力波动；工人无法安心离开土地——担心粮食价格暴涨时买不起粮食；资本不敢长期投资——投资回报高度不确定。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资产定价的失效。在生存焦虑笼罩的社会里，资产价格缺乏一个稳定的价值锚。丰年时，大家争相买地防身，地价虚高；灾年时，为了换一口救命粮，千金良田也可能被贱卖。这种剧烈的价格震荡，使得交易变得像赌博一样充满风险——买卖双方对未来的预期完全无法对齐，谈判陷入僵局，交易难以达成。即使勉强成交，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违约和纠纷也会接踵而至。亚当·斯密所说的“easy taxes”（便利的税收）会变得困难——当资产价值随着生存危机大幅摇摆时，政府应该征多少税就成了糊涂账，必然导致滥税与抗税的恶性循环。

归根结底，只有当**最基础的粮食和能源价格稳定了**，市场上的各种货物、服务与资产才能确切地定价。只有价格信号不再透露着生存恐慌，交易成本才能降低，分工才能深化，“有效市场”才能真正形成并运转起来。

五、温室花园：低风险天赋与西方的兴起

究其根源，工业革命为西方兴起提供了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孕育了这场工业革命的英格兰是“有效市场”自发形成的典范，但这不是某种抽象文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天选之子”的幸运：一种基于特殊地理禀赋、不可普遍复制的历史经验。

1. 自然彩票：被上帝偏爱的温室花园

英格兰拥有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受北大西洋暖流和西风带影响，降水全年分布均匀，没

有明显的旱涝季节变化，极端天气少，农业生产可预期性极强。与中国没有定数的季风气候形成鲜明对比，英格兰的农民不必担心今年丰收明年歉收的剧烈波动，某一块土地上的粮食产出可以相当准确地预估出来。

“有恒产者有恒心”。正是这种高度确定性（低风险），使得英格兰走上了一条与欧亚大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这里，人们关心的只是划好地界，写好租约。地里总能长出粮食，一分耕耘必有一份收获，并不需要为之忧虑。

2. 制度后果：幸运的奢侈品

在粮食产出忽高忽低、不够确定的欧亚大陆，收成好坏如同赌博般难以预料。如果采用定额地租，地租收低了地主喝西北风，收高了农民“久赌必输”。因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分成地租——你出土地我出劳力，按比例分配收获，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才是欧亚大陆上唯一可能的普遍制度。

而英格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都相当稳定，地主和农民才可以用最简单易行的“一口价”“五十年不变”来说定粮食分配的规矩——这就是长期定额地租制的由来。根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考证，在有据可考的英国历史上，短期分成地租没有明确记载；自中世纪甚或更早时期，“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就已在英国普及。

正因为这种制度简单易行，不留争议，没有后遗症，实行起来成本最低，让地主和农民双方都省心省力不吃亏，它才能够成为英格兰普遍采用的制度。这并非英国人比其他人更有“契约精神”，而是稳定的粮食生产赋予了他们采用这种制度的“奢侈”权利。“信心比黄金更宝贵”，长期定额地租制不仅仅是让农民和地主双方省心省力，更对整个社会的运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3. 经营方式演化：租地农场的兴起

在长期定额地租制的基础上，英国农业演化出了租地农场这种经营方式。租地农场主作为经营者，一方面向大地产拥有者租入土地、支付定额地租，另一方面从小农中雇佣农工、支付定额工资，土地产出由他独立出售，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剩余成为他独立所有的盈利。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正是现代企业的先驱——它与现代企业“定额利息支付给银行、定额工资支付给工人、独享剩余利润”的模式完全同构。

作为现代企业的先声，租地农场和现代企业一样有盈有亏，不是每一个都能活下去。幸好，得益于英国高确定性的粮食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确定性的物价和工资水平，这种扩大式的生产经营是有机会持续的，社会上总有它的生存空间，于是租地农场逐渐发展起来。

4. 社会秩序：斯密财富三要素的统一根源

粮食产出的确定性还带来了更深远的社会后果。在 1755 年的一篇演讲中，亚当·斯密提出了财富增长的三个要素：“除了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过得去的司法（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一直以来，这三个要素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一个落后国家走向繁荣，似乎是一个“集齐宝珠，召唤神龙”的寻宝故事。但从英国的历史经验来说，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斯密语境下的“和平”，不单是通常所理解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无战争），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安宁”——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弱冲突状态。正是不列颠岛上粮食产出的确定性，降低了生存焦虑，推动了英国社会生活弱冲突的、相对和平的基调。

一种持续和平的社会生活，一种所有产品与服务价格持续稳定的社会生活，对于各种社会冲突的仲裁需求，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上。仲裁需求低，征税需求也就较低；价格确定使得生产与交换盈利可期，分工水平较高，社会成员生活富足，缴税能力较强；财产价格确定使得应缴赋税容易计算，围绕征税的斗争更容易达成妥协——这就是税收之“便利”的由来。

同样的道理，英国社会冲突水平低，司法所面对的任务并不繁难，所需的资源也不缺少，于是“理性化不足”的普通法体系足以应对。如同夏威夷草裙代表着温暖的环境、代表着不需要对抗寒冷那样，英国盛行的普通法，正是英国特殊社会生活状况的表现。相比之下，欧亚大陆上社会生活是高冲突的，维持秩序所需的工作繁重而困难，需要巨额的税收支持，而高冲突的社会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不足以支持这样的税收需求，于是司法的需求与司法的能力形成悖论。“全靠同行衬托”，有了欧洲大陆这样一个糟糕的比较对象，英国的司法状况自然也算是“过得去”——这同样是“和平”的产物。

斯密所表述的繁荣国家的三要素“和平、便利的税收、过得去的司法”，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再三呈现着同一根源：英国粮食生产具有的高度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秩序。

5. 综合效果：有效市场的水到渠成

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还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农业革命。17-18 世纪，四轮作制（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的推广消除了休耕、提高了产量，畜牧改良使牲畜与种植有机结合、改善了土壤肥力，早期圈地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分散的土地。这场农业革命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稳定性，释放了大量劳动力。

作为岛国，英格兰任何地方距海不超过 120 公里，海岸线曲折，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天然良港众多，18 世纪运河建设热潮又将工业区与港口连为一体，运输成本极低。英格兰中北部煤炭储量丰富，约克郡、兰开夏、纽卡斯尔等煤矿靠近主要工业区和港口，为蒸

汽机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稳定、能源充足、交通便利——这些条件叠加，使得粮食价格平稳，市场风险低，产权价格可以确定，交易费用较低，劳动力可以安全离开土地，资本敢于长期投资，“有效市场”水到渠成地形成了。

6. 美国北方的复制

美国北方的条件与母国英格兰同样优越。新英格兰和纽约、宾夕法尼亚等中部殖民地属于温带湿润气候，受大西洋影响，降水稳定均匀，没有季风气候的剧烈波动。宾夕法尼亚土地肥沃，被称为“美国的面包篮”，小麦产量丰富，粮食价格稳定，农民收入可预期。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等优良港口星罗棋布，哈德逊河、特拉华河等内河可通航，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后更将大西洋与五大湖连为一体，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新英格兰虽然缺乏煤炭，但河流众多、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马萨诸塞州洛厄尔成为著名的水力纺织工业中心；而距离不远的宾夕法尼亚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运河可便捷运往沿海各州，为从水力向蒸汽动力的转型提供了能源基础。

农业稳定、能源兼备、水运便利——美国北方几乎完美复制了英格兰的工业化条件，“有效市场”同样自发形成，工业化顺理成章地展开。

7. 制度优越论：温室花朵的傲慢

英美崛起中蕴含着巨大“运气”成分，但是，后世的理论家们往往忽略这一点，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制度，搞私有化、市场化、价格放开，繁荣就会自动降临。这种观点否认了世界的复杂性，把这种基于特定时空条件的西方发展模式普世化，无异于一种廉价成功学——它无视了环境的馈赠，傲慢地将“天选之子”的运气，包装成了可被复制的能力。

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荒野上的烈日严霜的。对于那些处于“困难模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缺乏上帝赐予的稳定生产环境，盲目复制这种基于好运的制度，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中国不同。

六、 工程师的荒野：高风险挑战与低分工陷阱

中国面对的，是地理环境带来的“荒野挑战”。季风气候带来的旱涝不定，山地丘陵占据的大部分国土，人均耕地的严重不足，近代以来化石能源的相对贫乏——这些都是摆在中国现

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在这里，划好的地界，定好的契约，都招架不住来自洪水与干旱的致命一击。

1. 无法维系的分工：双重困境

传统中国的农业困境由来已久。我们可以从一首相传为描述河东盐池的上古歌谣说起：

- >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 >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这首《南风歌》相传为舜所作。“南风”是来自东南方向的夏季季风，它携带的降雨和高热决定了农业、盐业收获的丰歉。“南风之时”——按时到来的季风，可以帮助人民收获财富；“南风之不时”——没有按时到来的季风，则会带来损失甚至灾难。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建立这五千年来，从农业到工商业，先民的所有生产都长久地处在这种风险的威胁之下，发展受阻，这一局面从未根本性改观。

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通过价格波动创造了一个双重困境。让我们以河东盐池周围的居民为例来理解这一困境。河东盐池位于山西运城盆地，盐池周围土地盐分较多，不适合耕种。假如盐池周围的晒盐人专心晒盐，去和良田上专心耕作的人交换粮食，那么双方都能得到分工交换的好处。但现实中，这种分工却难以自发形成。

季风是不稳定的，“南风之时”没有定数。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种粮的人会减少粮食出售，而晒盐的人会发现，无论他收获的盐或多或少，此时他的产品相对于粮食总是贬值了，所能换到的粮食更少了。极端情况下，种粮的人为了维持生存会停止出售粮食，晒盐的人就要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危险。因此，为了保障生存，晒盐的人无法完全依赖交换获得粮食，也必须自己种粮来维系起码的生存底线。历史上，由于盐是重要税源，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盐户，强制他们专职晒盐。但这种由官府维持的专业化同样是脆弱的——一旦粮价暴涨，盐户或依赖官府救济，或逃亡兼营，史载多有盐户生计艰难、纷纷逃散的记录。

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一切行业。一方面，专心种植的人很难获得稳定的收入——丰年时粮食多但价格低，卖不出好价；灾年时粮食少需要自己吃，也卖不出多少。他难以通过售卖粮食稳定维持生计，所以必须在种植之外做手工业挣钱，购买其他用品，甚至补充粮食。另一方面，专心从事手工业的人挣的钱也没有把握买到足够粮食谋生。平年时，手工业收入可以买到足够粮食；但灾年时，粮食价格可能暴涨数倍，购买粮食花费更多还会导致对手工业产品需求的下降，这样的价格剪刀差会使他买不到足够粮食，面临生存危机，因此必须自己种一些粮食作为保底。

这种双重困境导致了黄宗智所描述的清末江南和华北的“内卷化”现象：农民既种地又做手工业，家庭所有成员都要劳动，劳动时间极长，劳动强度极大，极度勤劳却极度贫困。《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讲到德国的类似情形：“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欧亚大

陆凡是粮食生产不稳定的地方都能看到。

"内卷化"的本质是低分工。由于规模化的工商业经营无法建立——没有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大家都只能困守在小土地种植和分散的小规模手工业上。

2. 为什么规模化经营无法建立？

低分工就是规模化的反面。传统中国的棉布业就是这种低分工困境的典型写照。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是最重要的非农产品，用于市场销售的商品量约为 3.1 亿匹，看起来规模并不小。但这些布基本上都是乡村生产、就地销售，离开本乡本城的销售占比不到 15%。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在耕种之余由家庭兼职生产的。于是，在这个规模最大的非粮食行业里，生产与销售都极度"在地化"，人力物力极度分散，无法成长出规模化的工场手工业。

为什么规模化无法建立？因为市场风险极高。从需求端看，消费者收入不稳定，市场需求波动大，企业无法预期稳定的销售；从供给端看，劳动力困守土地无法稳定转移，农忙时工人回家种地，工厂无法维持稳定生产；从资本端看，投资回报高度不确定，资本不敢投入需要长期回收的大规模生产项目。即使在少数集中产区能找到一些专门其事的织户，但他们有限的盈余很快就会被不断变化的粮食价格吞噬，无法积累、无法扩大规模。

当无法规模化生产时，就无法深度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分工是财富的源泉，他著名的针厂例子表明，10 个工人通过分工协作，效率可以提高数千倍。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市场范围"的真正含义不是地理大小，而是市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一个波动剧烈的大市场，不如一个稳定的小市场。

那么，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形势，这些数量有限的小工场能否通过引入高效机械来弯道超车、突破瓶颈？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购置机械需要高额的一次性投资，而工场主的盈利不断被粮价波动吞噬，难以积累足够资金。借贷购买呢？同样是由于粮价波动，社会上的一切物价都不稳定，借贷成为高风险活动，因此人们能找到的借贷来源往往是高利贷，资金成本极为高昂。即使获得资金，收回投资并盈利的前景又如何？产品的远期价格和成本都难以预估，购买机械投入的资金什么时候能够收回继而盈利，也是难以预料的。一个严肃谨慎的经营者不应该冒险购入机械，而一个任性豪赌的经营者将很快被现实惩罚。在这重重障碍之下，传统中国的小型工场要跨越式地进入机械时代，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高市场风险下，人们只能困守在低分工状态：家庭作坊什么都做，一家人既种地又做手工，两样都做不精，没有规模经济，没有专业化，效率极低。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试图补偿效率损失，结果是极度勤劳却仍然贫困。这就是"内卷化"的真实机制：不是人口压力导致的非理性行为，而是高市场风险下无法实现深度分工，被迫困守低效率小规模生产的被动状态。

3. 人口压力的双重机制

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还通过双重机制推动了人口增长，加剧了人地矛盾。

第一个机制是“人口锁定”。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使人们不敢完全离开农业。一旦离开土地，就必须通过市场购买粮食维生。当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时，这是可行的；但当价格暴涨时，挣来的钱可能买不起、买不足粮食，从而生计困难，甚至无法维生。因此，理性的人不敢承受这种风险，大量人口被“锁定”在土地上。

第二个机制是“鼓励多生”。即使通过农业种植维生，也会因为粮食生产不稳定而遇到生存危机，引发社会冲突。在高冲突水平的社会里，通过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成为优选策略——既能互相救济（有粮的帮助没粮的），也可以团结御敌（防止其他宗族抢劫），还能获取资源（必要时集体抢劫）。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多就意味着力量大、生存机会高，这就引发了对早生多生孩子、人口增殖的追求。**“多子多福”不是凭空的文化偏好，而是高风险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两个机制叠加，造成了大量人口困在有限土地上的极端困境。耕地面积有限，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均产出降低，更容易遇到粮食短缺，形成人地比与粮食风险互相推高的恶性循环。相比之下，英格兰和美国北方各州，由于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价格相对平稳，人们可以安全地离开农业进入工商业，社会冲突水平低不需要依赖大家族，生育率自然较低。结果是，相对于耕地面积，总人口不高，人地矛盾不突出，这大大提高了社会稳定性，也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4. 技术适应环境：大纺车的失传

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粮价普遍不够稳定，小生产成为工业革命的障碍是普遍现象。当然，某些时候某个地方也可能有短暂的风险降低，从而催生出先进机械，比如元代中国就曾制造和使用复杂度和效率已经非常高的水转大纺车，它拥有 32 枚锭子，通过巨大的水轮驱动，机械构造复杂，加捻效率惊人，但随着明代以后棉花在中国的普及，以及人口压力导致劳动力变得极度廉价，这种适合处理长纤维（麻）且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得无利可图。大纺车虽然先进，但缺少需求使得技术迭代链条断裂，导致它并没有演进到适合于棉花（短纤维）纺织的新版本。大纺车的遭遇代表了那些曾经领先世界的先进机械，它们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没有稳定的环境和随之而来的持续需求，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演化为工业革命。只有在英格兰，粮食生产的风险才降到了最低，粮价足够稳定，并且这种低风险状态非常稳固、长期持续。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人口密集、煤铁水力资源并不比英国更为缺乏的欧亚大陆上。

如果按照自由放任的市场逻辑，在中国这样的高风险条件下，很难自发形成支撑工业化的“

有效市场”。面对这道困死无数文明的难题，单纯的“制度改革”是无效的。必须有人像大禹一样，站出来修水库、挖运河、改造物理世界。

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通过“有为政府”的主动作为，投资于农业进步和能源进步，系统性地降低市场风险，人为地创造出“有效市场”的条件。

七、伟大的奠基：前三十年的工程奇迹

在理解前三十年的意义之前，需要理解革命本身的深层原因。革命本身是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崩溃引发的，而它的最深层原因，就是生产体系的崩溃。清末民初，传统农业无法支撑激增的人口，西方冲击又破坏了原有生产体系。粮食短缺、物价暴涨、货币崩溃。当价格剧烈波动到一定程度，产权的价格完全无法确定，交易费用变得无限高，市场经济彻底瓦解，社会秩序全面崩溃——饥荒频发、流民遍地、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是重建生产和秩序的历史必然。

革命的成功，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重建稳定的生产体系。革命成功创造新秩序，强化社会组织，带来稳定生产、从而进一步改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先打赢一场针对落后农业的翻身仗。既要稳产，又要高产，只有彻底克服悬在头顶的粮食风险，现代化的地基才能打牢。这是一场现代版的“大禹治水”，是再造中华山河的不世伟业。

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不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弯路”，而是一个系统性地降低市场风险、创造“有效市场”前提条件的奠基过程。

1. 计划体制：废墟上的工程指挥部

建国之初，中国在实质上仍是一个传统国家。全国总人口 5.4 亿，其中农村人口 4.8 亿，城镇人口比例仅为 11%，真正的城市人口更只有 5% 左右。长期战乱之后，粮食生产虽有恢复，但受制于传统技术条件，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 300 公斤上下，粮食剩余有限且不稳定，依赖粮食剩余供养的城镇人口因此比例低下。而这样少的城镇人口，根本无法支持全面的工业发展。当时既有的所谓现代化成果，不过是无根的舶来之物。

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下，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展开了。

经常有人以“短缺经济”来批评前三十年的计划体制，认为统购统销导致了物资匮乏。**短缺固然是事实，但把它归咎于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历史的短视。** 我们不应忘记，在计划体制建立之前的清末民国，中国何曾有过不短缺的时候？那时的短缺，是经常性的饥荒和遍地的饿殍，是毛泽东所痛陈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

拖拉机都不能造”。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在当时极度高风险的生产环境下，基于自由交换的大市场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交易成本无限高，分工无法进行。列宁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计划体制的实质，是在大市场无法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行政力量，以有限的粮食剩余为锚，创造并维系一个“小市场”。

一言以蔽之：不是计划体制导致了短缺，而是短缺导致了计划体制。

在这个由国家信誉担保的封闭体系内，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科研部门得以在与外部动荡隔绝的环境中进行稳定的复杂分工。相比于理想中的“大市场”，这种体制确实是低效和僵化的；但相比于当时处于瘫痪和内卷状态的大市场，它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是这个被勉力维系的“小市场”，孕育了中国工业化的火种，维系了起码的社会化大生产，避免了国家经济的全面性坍塌，并为大市场的未来爆发准备了前提条件。

2. 改造物理世界：现代版的大禹治水

前三十年，中国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基础建设和农业革命：

* 基础建设的系统推进

五十年代初，以苏联大力援建 156 项工程为核心，全国开工建设了 921 个大中型工业项目，包括石油、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化工和轻工等民用工业和兵器、航空等国防工业。同时，中国大力发展铁路、公路、航空、内河和海上运输，以及邮电事业。成昆铁路、青藏公路等在极端地形条件下建成；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的开发实现了能源自给。这些早期建设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推动了中国的军事进步，加上六十年代在原子武器上的突破，保障了内外和平，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可能。电网建设和铁路公路网虽然与今天相比成就有限，但已初步构建起覆盖主要区域的基础框架。这些在当时看来或许“不经济”的投资，实际上是在为后来的全面工业化铺路。

* 农业革命的逐步推进

更重要的是对农业的系统性改造。在季风气候对农业的不利影响下做到稳产高产，就需要强大的水利设施对抗旱涝灾害，需要农药保障稳产，需要化肥和高产种子保障高产。通过推广“水、肥、药、种”四大要素，中国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农业革命：

* **水利化：**新中国一建立，就展开了战天斗地的治水斗争。五十年代治淮工程形成了蓄泄兼顾的防洪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从此消除了重大水患。此后，黄河、长江、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全面展开。大跃进期间及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规模宏大，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有半数以上始建于这一时期。到七十年代末，8 万多座水库建成（占今天总数的 90% 以上），数百万公里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有效灌溉面积从建国初的 2.4 亿亩增长到约 7 亿亩，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这不只是“搞建设”，而是系统性地降低粮食产量的波动性。

* **化肥化:** 化肥工业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五十年代末苏联援建的中型化肥厂投产，此后陆续建设了一批以煤为原料的中型厂，到 1979 年达到 50 个。但产量仍远不能满足需求。七十年代“四三计划”从西方引进 13 套大型化肥装置，这些装置在 1979 年前后集中投产，化肥产量由此大幅跃升。然而，化肥建设的累积效果要到八十年代才真正释放——1980 年化肥施用量约 1270 万吨，到 1990 年已超过 2500 万吨，粮食单产随之大幅提高。

* **农药化:** 农药工业从五十年代起步，最初主要生产有机氯农药（如六六六、滴滴涕），六七十年代逐步发展有机磷农药和其他品种。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农药工业体系，年产量达到 40 万吨左右。农药的普及使病虫害防治能力大幅提升，减少了粮食损失。据估计，农药的使用可挽回 15%-30% 的粮食产量损失，对稳产贡献显著。

* **良种化:** 良种培育是一项长期积累的工作。五六十年代主要依靠传统选育方法改良品种，成效有限。七十年代迎来突破：1973 年袁隆平团队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1976 年开始大面积推广，使水稻单产提高 20% 以上；李振声通过小麦远缘杂交培育出抗病高产的小偃系列品种。高产良种不仅提高了单产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和环境适应性，使产量更加稳定可靠。

这场农业革命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前三十年，伴随着人口几乎翻倍的增长，人均粮食产量长期稳定在 300 公斤上下——这本身就是巨大成就，意味着水利和农药带来的稳产效果已经显现。但更大的突破还有待化肥和良种的效果释放。从八十年代开始，前三十年累积建设的化肥产能集中投产，高产良种全面推广，粮食稳产与高产两翼齐飞，人均粮食不再徘徊于 300 公斤上下，而是节节攀升。它不仅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更重要的是系统性地降低了市场风险：粮食产量的稳定性大幅提高，年际波动显著减小，粮食价格趋于稳定。

当粮食价格趋于稳定，一系列连锁反应随之发生。各种商品和资产都有了相对确定的价格，买卖双方容易达成一致，做生意的成本大大降低；政府征税有了清晰的依据，少了许多争议和冲突。最关键的是，劳动力终于能够安全地离开土地——农民不再担心粮价暴涨时买不起粮食，可以专心从事工业劳动；企业敢于建立大规模工厂，进行长期投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从低分工走向高分工的条件由此创造。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解脱了土地的束缚，走进了工厂车间……

前三十年不是弯路。它是“大禹治水”的现代演绎，是“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的历史进程，是为全面工业化开创道路的必要准备。尽管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件，但是，它是传统的终结、现代的孕育，是五千年文明史的根本转折。没有这个过程，后四十年的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因为“有效市场”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存在。

八、 市场的爆发：从物理奠基到全面起飞

当基础条件具备后，后四十年的工业化爆发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这同样是一个关于发展的伟大故事。

农业革命的成果释放出巨大的潜能：充足而稳定的粮食供应稳定了社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工业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持续积累的基础建设开始发挥效用——铁路、公路网络支撑了大规模物流，电网、通信网络降低了工业化成本，工业门类的完整性加速了技术扩散。

1. 从低分工到高分工的历史跨越

中国的工业化展现出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其深层机制是实现了从低分工到高分工的历史跨越。改革开放后，数亿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困守土地、兼营农业和手工业，而是可以专心从事工业劳动。这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而是分工水平的根本性提升——当农业稳定、市场风险降低后，人们才敢于放弃自给自足，专门从事某一种生产活动。

中国建立起大规模工厂，实现了深度分工和流水线协作。纺织厂数千人、电子厂数万人、汽车厂的流水线，每个工人专门从事特定工序，熟能生巧，效率大幅提高。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带来的效率革命——针厂的例子在中国大地上千万倍地复制。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根本原因不只是廉价劳动力（这只是表面现象），而是实现了深度分工——这才是效率的真正来源。当别的发展中国家还困在低分工状态、劳动力困守土地时，中国已经实现了数亿劳动力的专业化协作。这种组织能力和分工水平的差异，才是竞争力的根本来源。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全面发展，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推进，从模仿到创新的能力跃升，从世界工厂到科技强国的转型——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持续了七十年的基础建设所创造的低市场风险环境和高分工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未停步于传统工业化，而是在工业能力的基础上，率先向新能源革命进军。光伏、风电、储能技术、电动汽车——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突破，正在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开创道路。尤其是光伏和动力电池，中国已占据全球产能的绝对主导地位，掌握了新能源革命的核心命脉。

2. 对林毅夫理论的修正：工程师的视角

必须指出，林毅夫虽然提出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对重要概念，但在他那里，这两者基本上是平行关系——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市场配置资源，两者配合就能成功。这是对中国道路的表面化理解。

“有效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只要私有化、市场化、价格放开就会自动出现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效市场”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低市场风险、产权价格确定、交易费用低。而这些前提条件都建立在粮食生产稳定、能源供应稳定的物质基础之上。

有观点认为前三十年走了“弯路”，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违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资本密集

型的重工业，导致了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依靠政府输血维持，造成了资源错配和轻工业短板，成为必须正视的历史教训。

但如果我们跳出单纯的“产业效率”视角，从“生存风险”的维度来看，就会发现前三十年的另一重意义。

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时中国要“违背比较优势”去搞重工业？除了国防需求外，一个被经济学家常常忽略的原因是：**现代农业的稳产高产，本质上是用重工业产品“改造”自然的过程。**

如果没有钢铁和水泥工业，就无法修建数万座水库和配套的灌溉渠系；如果没有机械制造业，就无法生产合成氨所需的高压设备，化肥工业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化学工业，农药就无法普及；如果没有电力工业和电机制造，覆盖农村的电力排灌网就无法建成——而正是这张网，在旱涝灾害面前守住了农业的底线。

前三十年看似“低效”的重工业投入，实际上是在为农业这一“高风险产业”注入工业化的硬核力量。“弯路”理论看到了赶超战略在局部效率上的损失，但低估了这套体系在全局上为中国打造“安全底座”的战略价值。

前三十年的各种基本建设，完成了从水利、化工到机械的农业工业化配套体系。它们恰恰是在创造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先解决农业不稳、能源匮乏、交通闭塞这些根本性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本就无法存在，比较优势也无从谈起。只有粮食供应稳定、价格波动减小、市场风险降低后，产权价格才能确定，交易费用才能降低，劳动力才能离开土地，规模化生产才能建立，——“有效市场”得以形成，比较优势才会出现，深度分工得以实现，产业升级才会成功。

这就是中国道路的根本所在：不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简单配合，而是**“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先通过大规模投资降低市场风险，然后市场机制才能有效运转。

九、治理的特征：程序正义 vs 结果交付

中西治理的差异，可以类比为“工程师思维 vs 律师思维”，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其行为逻辑。

姚洋提出“中性政府”理论，认为中国政府相对超脱利益集团，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贝淡宁和王绍光提出“贤能政治”，认为政治权力应该由有德行、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行使；林毅夫强调“有为政府”，主张政府因势利导，提供基础建设和产业引导。这些看似不同的理论，本质上描述的是同一个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巨大生存压力下形成的独特治理形态。

1. 压力倒逼下的必然选择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普遍面临高风险的生存和生产环境——农业不稳定、市场风险高、社会易失序。这种压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存威胁：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饥荒、动荡、崩溃。政府的建立、生存，都要面对来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巨大挑战。如果不集中力量于效率和谋划去改进生产能力、改善社会状况，政府自身能否持续存在都会是问题。

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纪律”。如果被利益集团俘获，资源分配就会失衡，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如果用人不当、官员无能，政策就会失误，治理就会混乱；如果不着眼长远、不投资于长期能力建设，社会就无法应对未来的危机与挑战。这些后果，轻则动摇统治根基，重则导致政权覆亡。

因此，政府被迫具备多重特征：必须“中性”（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必须“贤能”（选拔有能力的人），必须“有为”（主动创造条件），必须着眼长远（投资于当下未必见效但关乎未来的基础能力）。

这不是道德选择或文化偏好，而是生存压力的倒逼。 压力是最强大的纪律约束，迫使政府不得不具备这些特征。不是政府“想要”中性、贤能、有为、长期主义，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是政府道德高尚，而是生存本能。

2. 工程师治国的优势：结果交付

中国模式下，治理的核心是工程管理与结果交付。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法治或规则——中国历史上同样不乏秩序与规则的伟大奠基者（如周公与孔子），他们确立了人与人的伦理秩序。但在高风险环境下，工程师思维（解决物理约束）必须优先于律师思维（界定权利边界）。人才类型的差异就体现了东西方的这种不同。中国模式下，治理的核心是工程管理与结果交付，领导层中有大量工程师出身的官员，而英美的政治精英则多来自法学院。这并非偶然。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改造自然——兴修水利、建设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工程问题，需要工程师思维来解决。**大禹治水的传说，正是中国模式的象征性起点：**这位圣王本人就是一位勤于职守，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水利工程师；此后数千年，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黄河治理，直到新中国的水利建设、铁路电网、能源开发，无不延续着这一脉络。

在几千年生死存亡中磨练出的工程能力，最终会沉淀为一种文明的本能。

就像一个长期在风浪中搏击的水手，即便到了平静的港湾，依然保持着敏锐的直觉和强健的体魄。新中国从零起步的建设经验，已经转化为了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肌肉记忆。

这种能力不再仅仅是为了应对生存危机，而是升级为了追求发展的动力。即使在今天，外部

压力相对减小，中国依然能够保持长期规划的定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从新能源布局到‘一带一路’，这种‘工程师治国’的实干基因，始终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3. 律师治国的困境：程序至上

相比之下，西方尤其是英美，面临的自然和社会挑战都比较小。粮食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稳定，政府的生存压力不大。这样的低压力环境允许政府“偏私”、“平庸”且“无为”，这是舒适的特权——因为这些行为的代价不够大。最坏结果不过是选举失败，而不是政权崩溃、国家灭亡。

比如，英国发展出了成熟的**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传统。在低风险环境下，对于规则的强调和对于权利的保护，是一套低成本的且行且看（muddle through）治理方案。而美国则将这种逻辑推向了极端。美国地理条件优越，工业化时间早、成果大；地缘环境同样优越，两大洋隔开了潜在的入侵者，周边也没有强国威胁。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亚非拉国家力量微薄，欧洲大陆深陷分裂，美国从未遭遇过足以撼动其根基的外部挑战。这种**长期的舒适区生存**，掩盖了其治理体系日益陷入程序主义空转的痼疾。其治理模式异化为了过度诉讼化的“**律师治国**”——面对危机，精英们往往沉迷于法律条文的辩论，而丧失了动员人力物力解决根本问题的能力。所谓的“否决政治”，本质上是程序正义对行动能力的瘫痪。

然而，在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兴起的今天，面对一种基于实干精神与工程能力的全新竞争，美国治理能力的薄弱将会日益凸显。

4. 苏联的悲剧：强组织撞上高门槛

苏联的案例则提供了另一种对比。

作为曾经的同盟者，苏联的政治结构与中国类似，同样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却始终未能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由于地处高纬度，约三分之二国土为永久冻土或季节性冻土，有效农业区有限，生长季短，降水不稳定。受制于这种刚性的气候约束，苏联粮食产量始终大幅波动，1980年代在1.5亿吨至2.1亿吨之间剧烈起伏，多次严重歉收。粮食生产的极度不稳定，使它无法像中国那样创造出“有效市场”的前提条件。

结果就是，尽管举国体制使苏联在军工、航天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农产品长期短缺，工业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得不依赖出口石油换取外汇购买粮食，1980年代年均进口粮食三四千万吨。而石油和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都高度不稳定，1985-1986年油价从每桶30美元暴跌至10美元以下，导致硬通货收入骤减，财政收支瞬间失衡。粮食必须进口，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又在持续消耗，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外债高筑。长期的财政失血，对苏联的最终崩溃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苏联的教训表明："有为政府"是创造"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具备改造自然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幸运在于，虽然面临严峻的农业挑战，但季风气候毕竟提供了基本的降水，通过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革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问题是可解决的。苏联则受制于更为刚性的气候约束，受制于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即使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难以从根本上克服。今天的俄罗斯在各种时运变化之下，农业状况已有极大改善——只是对于苏联来说，这场农业革命来得太晚了。

十、 西方的兴起：掠夺是"助力"而非"动力"

在讨论中国道路时，不能回避一个流行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西方通过殖民掠夺和金融掠夺积累了原始资本，实现了工业化，而亚非拉被掠夺，沦为边缘。这种理论虽然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罪恶，但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金银最多、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从 1492 年开始，持续 300 年，掠夺了整个拉丁美洲的金银。按照世界体系论的逻辑，西班牙应该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实际结果恰恰相反：西班牙最终成为"黄金漏斗"，财富流过却无法增殖，导致它快速衰落成为二流国家。

为什么？因为西班牙自身农业发展困难重重——地中海气候，农业不稳定，工商业不兴旺。掠夺来的黄金财富，主要用于购买外国商品、维持军队、奢侈消费，迅速流出，无法在国内增殖。黄金流向了哪里？流向了荷兰、英国、法国等有工商业基础、有财富增殖能力的国家。

相反，英国早期掠夺较少，但凭借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发展出繁荣的工商业。纺织业、造船业、商业、金融——这些产业可以让财富增殖。英国通过贸易挣来的金银，投资于自身，产生更多财富，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英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霸主。

法国、德国在农业稳定性和工商业繁荣方面，也都不及英国和美国北方。虽然它们也有殖民掠夺，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如英美。这再次证明：掠夺不是富强的根本。

西方的兴起，殖民掠夺、金融掠夺都是"助力"，而非"动力"。"动力"本身是农业稳定带来的工商业优势。 西北欧的降雨稳定，粮食价格波动小，市场风险低，人口可以离开农业，工商业得以发展，深度分工得以实现。有了工商业优势和财富增殖能力，才有了军事和商业上的力量去掠夺他人。

掠夺是工商业进步的后果，是兴起的"助力"，而不是兴起的"动力"。这是对世界体系论的根本性纠正——不是掠夺导致富强，而是农业稳定导致工商业发达，才有能力掠夺。把因果关系搞清楚，对于理解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当然，彰显西方殖民掠夺的罪恶，强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道德优越性，这种叙事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过犹不及，刻意强调殖民掠夺的罪恶，往往使我们陷入另一个陷阱——它过度贬低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创造性成就，将现代化进程歪曲为掠夺与被掠夺的二元对立。这种姿态既无益于我们虚心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经验，也无益于在平等基础上与西方展开理性

对话，更在深层次上暴露出一种缺乏自信的防御心理。正如赛场上的较量，如果我们将对手的胜利完全归结为卑鄙的犯规，那也就连带否定了我们与其同台竞技的含金量。

十一、 真正的领袖：共情互助胜过傲慢说教

回顾这个完整的人类发展故事，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谁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

真正的领袖，不能只懂得在风平浪静的温室内种花养草，更必须懂得如何在狂风暴雨的荒野上绝地求生。

1. 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困境

必须明确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良，不是因为压力小、生活容易，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困难往往超过中国，而且大到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

* **西亚北非：**地处副热带干旱带，农业天然受限于水资源匮乏。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曾孕育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数千年灌溉导致土壤盐碱化日益严重，农业产出长期衰退。现代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干旱趋势，而频繁的战乱又破坏了原有的灌溉系统。根本问题是降雨太少、蒸发太强，水资源总量严重不足——这不是修水库、开运河能解决的，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水源可供调配。

* **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气候导致高温高湿、病虫害严重、土壤养分流失快；降雨分布极不均匀，雨林区过湿、草原区干湿季分明、半干旱区降雨稀少，季节性洪水与旱灾频繁交替；热带雨林土壤看似肥沃，但是因为植被中的有机质在腐败过程中产生酸性，对土壤中的矿物质造成淋溶作用，使土壤因为缺乏矿物质而贫瘠。疟疾、血吸虫、锥虫病等疾病环境恶劣，削弱劳动力；缺乏天然良港，瀑布阻断河运，内陆运输困难，交通建设代价巨大。这些综合起来，使得农业天然低产且不稳定，而且人力改造的难度和成本极大。

* **印度：**印度的降雨极不规律——季风的到来时间、强度、持续时间都高度不确定，年际变化极大，而全国农业高度依赖这单一雨季；高温高湿使病虫害全年繁殖，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疟疾等热带疾病普遍存在，削弱劳动力。**印度面临的自然条件比中国更加恶劣。**

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困境的典型。

恶劣的农业条件从传统上制约了印度的国家建设能力。农业灾害频发、产量剧烈波动，意味着可供征收的剩余少且不稳定，财税基础天然薄弱。财税不足，就无法支撑庞大的常备官僚系统和大规模常备军。与中国两千年大一统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历史上统一在集权政府下的时期极为短暂。孔雀王朝的强盛期不过数十年，莫卧儿帝国的实际统一期约一百五十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制度依赖农业税收支撑官僚-军事系统，一旦扩张停止，剩余不足就会凸显，系统就会迅速瓦解——奥朗则布去世后

不过数十年，帝国便分崩离析。印度不是不想统一，而是农业条件根本不支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的长期维系。

因此，与中国不同，印度历史上就缺乏“有为政府”的传统。进一步的，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其中的原因仍然是物质基础——农业条件制约了国家建设的可能性，印度历史上没有积累起像中国那样可供继承的组织传统和治理经验，这就导致印度没有产生能够领导彻底革命的强大组织。结果就是，印度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虽然赢得了民族独立，但旧的种姓制度、宗教势力都被保留下来；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印度条件下导致短期主义、党派斗争、身份政治撕裂社会。

印度的困境是双重的：面对比中国更大的自然挑战，既缺乏历史积淀的组织遗产，又未能通过革命创造新的组织能力。

2. 西方的傲慢说教与中国的建设行动

西方国家习惯了撒下种子就有收获的幸运，便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阳光（自由）和雨露（市场），鲜花就会自动盛开。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种幸运。它们面临的是和中国相似的困境：贫瘠的土壤、暴烈的气候、匮乏的资源。西方国家无法理解这种苦难，因为他们从未真正面对过那种基于自然环境的生存绝境。面对陷入“高风险陷阱”的南方国家，西方只有以己度人的傲慢说教：它们指责这些国家“不够自由”、“政府管得太多”、“市场不开放”，甚至在这些国家遭遇危机时落井下石，利用贸易和武力的双重优势进行掠夺。这种态度，不仅是‘何不食肉糜’式的无知与傲慢，更是利用他人生存危机进行残酷收割的伪善。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领袖”，正是因为他通过自身的浴火重生，掌握了破解人类生存困境的密码。中国证明了：即使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类依然可以通过“有为政府”组织基本建设，通过系统性投入主动改造环境，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西方无法复制的特质——**深层的理解与共情：**

- * **不搞虚伪的说教：**不强推意识形态。
- * **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输出基建能力。帮助非洲修铁路，帮助中亚建电网，帮助东南亚搞产业园。
- * **平等、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深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艰难，因此更愿意以平等之心尊重南方国家。

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互利共赢。中国帮助南方国家，不是为了建立某种依附体系，而是因为中国清楚地知道：只有当荒野被改造成良田，当更多的国家获得了生存的安全感，世界市场才会真正扩大，人类的文明才能真正从“丛林法则”走向“大同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它为所有这些处于“困难模式”的国家点亮了一盏灯，宣告了那个听天由命的“绝望旧世界”的破产，开启了人

类在逆境中共同维新的新纪元。

十二、 从霸权冲动到天下为公：世界秩序的未来

中国道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也正在深刻重塑世界格局本身。

冷战结束后，面对意识形态对抗消失后的世界，西方学界曾陷入两种截然不同的预判。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乐观地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塞缪尔·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悲观地预言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将导致不可调和的对抗。

然而，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一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 1994 年就预言：“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 30 年或 40 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面前，这两种曾风靡一时的论调都显得过时了：

“历史终结论”破产了，因为中国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西方模式并非普世的终点；“文明冲突论”失效了，因为中国展示了不同文明完全可以通过发展与合作，超越文化隔阂，实现共赢。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盲点在于：它们都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并非意识形态或文化身份，而是对生存与发展的永恒追求。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往往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而是工具。古代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蒙古西征，其根源都在于高风险农业环境下的生存压力——对土地、水源、贸易通道的争夺。正是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资源匮乏地区的人们才不得不向外扩张、抢夺资源，以弥补内部生产的不确定性。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

二战之后，工业化与绿色革命的结合，使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的农业剩余及其确定性得到了飞跃。化肥、良种、农药、灌溉——这些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粮食风险。从欧洲到东亚，主要国家都已完成了绿色革命，获得了基于低风险农业的和平秩序。

今天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都是同质化的现代国家。

尽管每个文明都保留了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对于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而言，社会秩序的基石不再是宗教或宗法，而是稳定的粮食生产、发达的工业体系和高水平的分工协作。亨廷顿式的文明分类掩盖了这些国家之间本质上的同质性——建立在和平秩序之上的现代化。

因此，如果要在历史中为中美竞争寻找先例，唯一可资对比的，不是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也不是英德在一战前的对抗，而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和平落幕的权力转移——那是世界历史

上第一次发生在两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之间的竞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不存在分歧与冲突。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依然动荡，但这并非源于文明冲突，而是发展的不平衡：粮食风险尚未完全释放，社会秩序转型尚未完成。此外，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也给许多资源型国家带来了持续的不稳定。

但能源风险与粮食风险有着本质区别。 粮食风险带来的是生存危机，能源风险带来的只是发展危机。随着粮食安全防线的筑牢，人类不再面临大规模饥荒导致的生存威胁，这使得今天大国之间分歧与对抗的烈度，远远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

中国崛起的独特性质

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不同，中国的崛起并不伴随着殖民扩张的冲动。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地理和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形成稳定核心区的文明。秦汉以降，农耕区边界基本确定。向外扩张至游牧地带、高寒山地或热带丛林，往往得不偿失，难以产生足够的剩余来支付统治成本。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而言，核心任务始终是内部治理——应对季风带来的旱涝，维系广袤国土的和平。

中国发展出的"朝贡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小成本维系周边安定的安全安排：通过丰厚的回赐和贸易特权，换取周边国家对中心地位的承认，双方各取所需，共享和平。这与西方殖民体系以武力征服、经济掠夺为核心的逻辑截然不同。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丝绸和瓷器，而非枪炮和殖民据点——这绝非偶然，而是中华文明内在逻辑的体现。

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没有殖民扩张的传统，也没有殖民扩张的需要。**

中国与南方国家：新型关系的可能

这一历史遗产，决定了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的独特性质。

在现实利益层面，对南方国家采取殖民式的欺压，只会将它们推向竞争对手，造成长远的战略伤害。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能力选择另一条道路：帮助南方国家从中国经验中获益，通过建设和贸易，在与繁荣起来的南方世界的平等往来中共同获益。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种新型关系的体现。与冷战时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同，它不以建立势力范围为目的，而是着眼于互联互通。当中国帮助非洲修铁路、帮东南亚建工厂、帮中亚搞能源时，这些投资不仅帮助当地跨越了发展门槛，也为中国自身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

这不是利他主义的慈善，而是互利共赢的理性选择。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核能、光伏、风电、储能、电动汽车——在这些决定未来的关键领域，中国已占据主导地位。**绿色革命降低了粮食风险，开启了文明合流的大门；新能源革命将降低能源风险，进一步消解各国分歧与对抗的物质基础。**

世界各大主要文明，无论其文化传统如何，都在走向同质化的现代国家。这不再是“西方的胜利”，而是人类文明的合流。

中国作为这一进程的领袖，不是要征服其他文明，而是要带领所有文明走出“生存焦虑”的漫长黑夜，共同迎接一个不再由霸权定义，而是由发展与和平定义的未来。

十三、 结语：其命维新

“其命维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寓意古老的邦国承担了全新的天命。在今天，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更预示着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一场从“丛林法则”向“天下为公”的根本转折。

中国的维新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美国神学”的框架内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是基于“大禹治水”的文明基因与“逆天改命”的奋斗精神，走出的一条建设者之路。这条路的本质，是否定地理环境的宿命论。它证明了：贫穷不是不可改变的诅咒，荒原可以通过工程被改造为良田。中国没有通过战争去掠夺外部资源，而是向内挖掘，通过艰苦卓绝的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在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发展的可能。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通过组织起来、征服物理世界从而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

世界的维新

但“其命维新”不只属于中国。

人类文明同样是一个“旧邦”——数千年来，它被锁死在“马尔萨斯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宿命之中。因为生存资源有限且不稳，文明交往受困于零和博弈；因为安全感匮乏，霸权与掠夺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这种宿命曾被视为永恒，正如伊斯兰历史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六百年前所断言的：“未来和过去的相似比两滴水的相似程度还要高。”

中国道路的出现，正在打破这重枷锁。

绿色革命正在解决粮食危机，新能源革命正在解决能源危机，中国引领的工程能力正在向全球扩散。当生存的底座被夯实，当发展的权利被普惠，人类文明第一次有机会走出“资源匮乏导致的永恒战争”，迈向“以建设替代掠夺”的新纪元。接力棒正在从“规则制定者”手中，传递给“工程建设者”。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再是基于霸权等级的“治人”，而是基于共同发展的“治天”。

维新的真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在与逆境的搏斗中持续进化，让“大禹治水”的实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了普世的光芒。

人类这个古老的物种，在克服生存恐慌的进程中，正在走出分流的宿命，迈向合流的未来。这同样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维新”——不是回到某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而是开创一个“天下为公”的全新纪元。

《圣经·创世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和人角力，都得胜了。”

中国与逆境角力而胜之，人类与命运角力而胜之——这就是“其命维新”的真义所在。

百川归海，万邦协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